

# 古巴导弹危机新论

## ——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结局的分析

郝 承 敦

**主要观点** 学术界关于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动机及结局等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多种偏颇的观点。笔者认为,苏联的决策动机,是以此形成苏美战略核力量方面的均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苏美合作,确保苏联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是以苏美的相互妥协而结束的,既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也没有彻底的失败者。

**关键词** 赫鲁晓夫 肯尼迪 古巴导弹危机

**作者**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山东 273165)

1962年 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苏美之间进行的第一次“核对抗”,曾使世界处于核战争的边缘,是东西方对抗达到顶峰的标志,因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然而,40年后的今天,关于赫鲁晓夫在这场危机中的决策动机以及在危机结局的评价等问题上,学术界的某些观点仍有偏颇。因此,笔者愿从历史观点出发,对危机的有关问题重新进行探讨。

—

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中远程导弹,直接向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对赫鲁晓夫这一举措的决策动机,学术界各持己见。一种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是为了保卫古巴,以使古巴免遭美国进一步的侵略。<sup>①</sup>另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缩小苏联同美国的核差距,形成相对的“武装力量的平衡”。<sup>②</sup>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赫鲁晓夫是施展“围魏救赵”之策,苏联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迫使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欧洲或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上

述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并未从根本上分析和把握苏联政府的决策动机。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是“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在赫鲁晓夫看来,要实现苏美之间的合作,其前提必须是双方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相当的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事务中谋求相等的权力与机会”的军事基础。<sup>③</sup>因此,苏联在古巴部署中远程导弹的决策动机,是企图以此形成双方军事力量方面的均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苏美合作,确立苏联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身兼苏联党政要职的赫鲁晓夫调整了外交政策,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西方国家以对抗为主的方针,代之以“和解”和对抗相结合的方针,其基本目标是,谋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大力加强本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争取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为此,赫鲁晓夫大力推行原子外交,追求与美国在政治上

<sup>①</sup> 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 4期。

<sup>②</sup> 张培义:《评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的败北》,《山东师大学报》1993年第 6期。

<sup>③</sup> 《苏《真理报》1961年 7月 9日。

的平等。因此,在导弹技术上能否追上并超越美国,就成为赫鲁晓夫考虑的最敏感的问题。在1955年7月举行的苏、美、英、法4国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即苏美交换军事情报并允许对方对其领土进行空中摄影。这严重触发了赫鲁晓夫的自卑感。他认为,这是美国利用科技优势公然欺侮苏联的一种霸气。因此,在1956年举行的苏联航空节上,赫鲁晓夫打破惯例,邀请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出席航空展,并展示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乞讨者,而是平等的伙伴”。<sup>④</sup>但是,赫鲁晓夫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建国180周年纪念日(即1956年7月4日)命令U-2高空侦察机首次在苏联上空飞行。虽然苏联已经察觉U-2飞机的飞行,但却因歼击机的飞行高度和防空火箭的射击高度不够而无可奈何。这使赫鲁晓夫的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赫鲁晓夫认为:“这次飞行是对我国人民民族自豪感的侮辱,是富大叔明目张胆地不肯尊重穷侄儿的主权的表现。”<sup>⑤</sup>1957年8月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此,赫鲁晓夫感到特别惬意。他认为:“世界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苏联已经把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甩到后面”去了。<sup>⑥</sup>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朝野普遍感到惊慌,认为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已领先于美国,苏美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因此,当1959年7月赫鲁晓夫接到访美邀请时,他认为,正是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的突破,才逼迫美国承认了苏联的大国地位。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给赫鲁晓夫壮行,苏联在赫鲁晓夫访美前特意向月球发射了一枚大型火箭,并将苏联的国旗和国徽放到了月球上,以此来增强赫鲁晓夫的谈判地位。赫鲁晓夫还将这次向月球发射的“小月亮2号”的球体模型作为礼物赠送给艾森豪威尔。在双方举行的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美之间合作的重要性,表示愿意与美国通过谈判解决所有的问题。戴维营会谈是赫鲁晓夫推行苏美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赫鲁晓夫认为,它是“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他认为,戴维营

会谈反映了美苏两大国战略地位的变化,美国实际上承认了苏联与美国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

对于赫鲁晓夫大肆宣扬的“戴维营精神”,艾森豪威尔却不以为然。他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年初,美国利用U-2飞机成功地进行了几次间谍飞行,对苏联战略核武器的部署进行全面侦察,拍下了大量间谍照片。美国情报部门还获悉,苏联曾由于U-2飞机的飞行高度而束手无策。这些情报使西方开始重新估价苏联的核能力。1961年秋季,美国国防部公开宣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导弹差距’,美国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战略优势。”<sup>⑦</sup>的确,在1962年,美国拥有大约200-250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大约只有50-70枚。美国的北极星潜艇中还有约144枚导弹。美国有600架以上洲际轰炸机,苏联只有约200架。<sup>⑧</sup>因此,在1961年6月与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进行的维也纳会谈中,尽管赫鲁晓夫大谈特谈“苏美之间的平等地位——相互毁灭的平等地位”,<sup>⑨</sup>却始终未获得美国的认可,赫鲁晓夫制造的第三次西柏林危机也以苏联的失败而结束。因此,赫鲁晓夫念念不忘苏联所处的战略下风,按导弹危机期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历克赛耶夫的说法,赫鲁晓夫“正在寻找能同美国人平起平坐的任何方法”,而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就是为了达到核平衡。通过这一部署,“事实上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了1倍”。<sup>⑩</sup>尽管如此,整个核力量的对比仍对美国有利。但这样做在战略上对苏联明显有利:它能使苏联对美国产生一种“平等”的威胁。“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俄国,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的

④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15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⑤ 同④,第157页。

⑥ 同④,第261页。

⑦ 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第86页,1970年英文版。

⑧ [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53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⑨ 同④,第444页。

⑩ [英]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第6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时候了。”<sup>①</sup>在危机期间,肯尼迪曾建议迅速安排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以解决危机。赫鲁晓夫同意这一建议,但主张将会晤推迟数天举行。“这期间我国的导弹已经安装到位,进入临战状态,这样我们的谈判,就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了。”<sup>②</sup>在赫鲁晓夫看来,在古巴部署导弹既是一种军事手段,又是一种政治手段,它除了保卫古巴和达到苏美战略平衡这些外在的因素外,还有其深层次的意义。“导弹的设置必然会带来同所得的战略利益不相称的政治后果”,<sup>③</sup>这就是说,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军事战略意义,即以此缩小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为苏美之间政治上的平等对话奠定基础,进而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对外战略目标。

## 二

对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评价,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在危机中实行“一退再退”政策,大丢其脸;受极“左”思想影响,中国学者也认为,赫鲁晓夫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笔者认为,上述评价都是不公正的。但令人不解的是,直至今日,某些学者仍然囿于过去的观点,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是失败者。“而且,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政治上的失败;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败,也是战略上的失败。”<sup>④</sup>也有的学者认为,在美国的压力下,“赫鲁晓夫终于仓皇败下阵来。这是苏联外交的大赌博、大失败和大耻辱,也是对赫鲁晓夫本人的一次沉重打击。”<sup>⑤</sup>

笔者认为,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是以苏美双方的相互让步和相互妥协而结束的。美国并不是绝对的胜利者,苏联也不是彻底的失败者。

(1)苏联用撤除在古巴的导弹换取了美国不再入侵古巴的保证。“我们已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联合国登记,公开发表声明,美利坚合众国不但自己不再入侵古巴,而且还将阻止其盟国入侵古巴。”<sup>⑥</sup>

1959年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独裁的巴蒂斯塔政权,推动了拉美的反独裁运动。古巴革命极大地触动了美国在古巴的利益,它采取的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美国不可容忍。中央情报局认为,“共产党

人和其他极端主义激进分子似乎渗入了卡斯特罗的运动”,这更使美国政府推行敌视、孤立和颠覆古巴新政府的政策。美国拒绝向古巴提供援助,多方干涉古巴内政,支持古巴的流亡分子进行反卡斯特罗政府的活动。美古关系急转直下。在此情况下,古巴开始向苏联靠拢。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应邀访古,在那里主持苏联博览会。米高扬赞扬了古巴革命,并与古巴签订了经济协定,规定苏联购买古巴蔗糖,向古巴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

古巴同苏联关系的发展,导致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1960年6月,美国决定削减古巴蔗糖的进口,并决定1961年完全停止进口古巴蔗糖。这使严重依赖蔗糖出口的古巴经济受到沉重打击。8月,美国又要求美洲国家组织抵制古巴革命的影响。10月,美国决定对古巴实行禁运。在古巴的美国石油公司拒绝为古巴加工苏联原油。美国中央情报局奉命组织和训练古巴流亡分子,准备入侵古巴。1961年4月,美古断绝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苏古关系进一步发展。1960年6月,双方缔结了供应苏联石油的协定。1961年和1962年,苏古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古巴对外经济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至1962年,它同苏联和东欧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83%,仅对苏贸易额就约占50%。而古巴对美贸易则急剧减少,几乎完全断绝。1960年10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1961年5月,他正式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更引起美国的敌视。

美国敌视和干涉古巴引起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也加剧了美苏之间的新的斗争。1960年,巴黎最高首脑会议流产,“戴维营精神”终结后,美苏围绕古巴的斗争公开化。6~7月间,赫鲁晓夫接连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封锁和干涉古巴,宣称“苏联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9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② 同①,第586页。

③ 同①,第699页。

④ 同②。

⑤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第13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⑥ 《1962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的几封往来信函》,《苏联外交部公报》1990年第24期(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

要为争取独立的古巴人民说话”,警告美国“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处于苏联达不到的距离”,“苏联的炮兵可以用火箭支援古巴人民”,“门罗主义”已经“过时了”。美国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要把古巴建成能在本半球为苏联目的效劳的国家”,宣布美国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主宰的政权”,“今天,门罗主义原则和它在1823年宣布的时候一样有效”。<sup>①</sup>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时就竭力主张武力解决古巴问题《纽约时报》以“肯尼迪提倡美国干涉古巴”为题大肆渲染肯尼迪的主张。<sup>②</sup>肯尼迪本人也多次表示,“应该防止卡斯特罗的影响向其他拉美国家蔓延”。<sup>③</sup>1961年,他上台伊始便宣布“共产党在本半球的统治是不能谈判的”,必须与古巴作斗争。1961年4月,在美国的策划下,1000多名雇佣军登上古巴吉隆滩,妄图以武力颠覆卡斯特罗新政府。但入侵者在72小时内即全部被古巴人民一网打尽。肯尼迪对这次行动的失败大为恼火,决心要拔掉卡斯特罗政权这颗眼中钉。他反复强调共产主义不能在古巴继续生存下去,并通过全美电视讲话告诉美国报界协会:“如果本半球国家不能承担义务阻止外界共产主义的渗入,那么,我清楚地表明,本政府将毫不迟疑地承担起它的基本义务……如果必要,不惜进行干涉。”<sup>④</sup>肯尼迪的强硬态度使古巴政府感到,美国当局正在准备规模更大的入侵活动,古巴流亡分子的“士气”又高涨起来。美国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扬言只需6个师的兵力即可摧毁古巴政权。此外,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古巴面临着美国军事入侵的严重威胁。

正当古巴渴望得到援助之时,苏联政府改变了不在本土之外建立核导弹基地的传统政策,于1962年上半年决定在古巴部署中远程导弹。吉隆滩事件和美国再次入侵古巴的威胁使苏联师出有名。赫鲁晓夫曾多次声称,苏联的行为是为了保卫古巴,他在危机期间给肯尼迪的信中提到,导弹是苏联“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设置在古巴的,而且仅仅是为了防御……我们的目的只是保卫古巴。”<sup>⑤</sup>

1967年,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当我们得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地方出现的时候,我们懂得,如果我们不给它帮助,它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因此,我和我的同事

们商量后,决定派遣一支火箭部队到古巴去。”<sup>⑥</sup>正因为如此,在危机的紧要关头,苏联名正言顺地以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作为苏联撤除导弹的条件,美国被迫允诺,既然美国已保证不再入侵古巴,那么苏联也就没有必要再在古巴部署导弹了。因此,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从古巴撤除导弹是“本着用妥协来换取妥协的原则去做的”。<sup>⑦</sup>这样,在“保卫古巴”的旗号下,苏联体面地从古巴撤出了导弹。在赫鲁晓夫看来,正是通过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才避免了美国继续入侵古巴的威胁。从这一意义出发,他认为,“加勒比海危机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是“一次辉煌的成功”<sup>⑧</sup>是有道理的。

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历史已经40年了。尽管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古巴作为一个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有别于美国的国家,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在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在美国各地与苏联争霸,但美国历届政府始终信守着肯尼迪政府关于“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从人口来看,美国是古巴的25倍之多;就国土面积来讲,美国是古巴的85倍之多;就综合国力而论更是天壤之别,一方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则是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轰炸利比亚,出兵巴拿马,打击伊拉克,轰炸塞尔维亚,充当世界宪兵,霸气十足,但生活在美国眼皮底下的弱小古巴却安然无恙。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不再受苏联的制约,它又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仍容忍在距离美国只有90海里的古巴存在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这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作出的国际承诺是有密切联系的。

## (2)苏联通过“一对一”的交换方式,即用撤除

<sup>①</sup>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第2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sup>②</sup> Kent Beck, *Diplomatic History*, V III Winter 1984, pp. 47-51.

<sup>③</sup> Sidney Kraus, *Great Debates*, 1960,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8, p. 430.

<sup>④</sup> John F. Kennedy,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 C. G. P. O., 1962, p. 306.

<sup>⑤</sup> 《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9日。

<sup>⑥</sup> *Sunday Thames times*, London, July 16, 1967.

<sup>⑦</sup> 同⑥。

<sup>⑧</sup> 同①,第709页。

在古巴的导弹换取美国撤除在土耳其部署的针对苏联的导弹,改善了国际环境,有利于本国的安全。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震动了美国及其西方世界。詹姆斯·基利安写道:“苏联人造卫星在天上发出的嘟嘟声,一场信心危机像由狂风吹动的森林大火一样席卷了美国。”<sup>②6</sup>这一成就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卫星本身,而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的巨大的SS-6运载火箭。这种运载火箭能将一枚弹道导弹送至数千英里之外的目标。苏联在8月还取得了另一项重要成就,在秋拉塔姆试验场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爱德华·特勒在电视上拖着长音说道:“美国输掉了一场比珍珠港更重要、更伟大的战斗。”<sup>②7</sup>巨大的苏联火箭从外层空间威胁美国,这种令人震惊的恐慌使美国惊恐不安。

苏联在空间和火箭方面取得的成就,促使北约国家政府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应当承担提供核威慑力量的责任,因为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瞄准了欧洲的城市。而美国也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导弹差距”对美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到1957年年底,美国政府决定在土耳其、意大利等国部署“雷神”和“丘比特”导弹。

美国在北约盟国部署中程导弹是诱发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因素。赫鲁晓夫指出:“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我们知道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是对准我们的。”因此,“我要决定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sup>②8</sup>苏联《外交史》也说:“苏联曾不止一次地建议美国撤除设在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但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sup>②9</sup>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通过在古巴设置导弹,使“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以此施加压力来迫使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

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是赫鲁晓夫在1962年5月访问保加利亚期间萌发的。他和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漫步在黑海岸边。元帅指着对岸的土耳其说,从设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基地发射的导弹可在6-7分钟内消灭位于苏联南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中心城市(如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克拉斯诺达尔)以及塞瓦斯托海尔海军基地,而苏联本土发射的导弹飞到

美国则需25分钟。赫鲁晓夫立即问马利诺夫斯基,为什么苏联没有权利像美国那样做?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导弹比如说放在古巴?美国用自己的基地从四面八方包围和钳制苏联,而苏联的导弹和原子弹却只能安置在苏联境内,这太不平等了,在数量和送达的时间上不平等。我们如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但可以抑制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而且还能引起他们的恐慌,使他们感到对绝对安全的幻想的破灭。

当古巴导弹危机处于紧要关头之时,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正式提出了以“一对一”的平等交换的方式来解决导弹危机。他指出:“各国都愿意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我们苏联政府怎样评价你们的行动呢?你们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的盟国,把军事基地建立在我们周围,在那里部署了自己的导弹武器。……古巴使您感到不安……是因为古巴距离美国海岸只有90海里。但是,要知道,土耳其和我国毗邻,我们两国的哨兵巡逻时彼此看得很清楚。难道您认为您有权要求自己国家的安全,要求撤除您所说的进攻性武器,而同时却不承认我们也有这个权利吗?”随后,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除苏联导弹,但要求美国“把同类的武器从土耳其撤走”。<sup>③0</sup>

赫鲁晓夫的建议使肯尼迪“陷入了一个十分难以对付的困境”,要么信守与同盟国土耳其签订的盟约,要么屈从于压力,从土耳其撤出武器。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副国务卿乔治·保尔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都倾向于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但肯尼迪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不能公开同意从土耳其撤除导弹,否则就会被盟友和敌人说成是“在压力下的让步”。他认为用撤出在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甚至还会引起一种慕尼黑心理。<sup>③1</sup>考虑再三,肯尼迪决定就土耳其导弹问

<sup>②6</sup> [美]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第21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sup>②7</sup> 同<sup>②6</sup>,第215页。

<sup>②8</sup> 同<sup>②6</sup>,第697-698页。

<sup>②9</sup> [苏]A. 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第7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sup>③0</sup> 同<sup>②9</sup>,第623-624页。

<sup>③1</sup> John G. Stoessinger, *Crusaders and Pragmatists*,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5, p. 147.

题私下同苏联达成协议。他一方面在 27日晚派自己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向苏联大使强调：“肯尼迪总统早就想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这些导弹……这次危机一结束，这些导弹就会拆除。”不过，这一承诺不能公开，不能作为“交易”的一部分。<sup>①</sup>另一方面，肯尼迪又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隐晦地表示，在古巴导弹危机解决之后，苏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缓和，“使我们能够按照您所公布的第二封信里所提出的建议，全力以赴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就‘其他武器’达成协议。”<sup>②</sup>对于美国这种秘密交易的方式，苏联表示同意，古巴导弹危机由此结束。

“白宫没有食言。10月29日麦克纳马拉下令：在1963年4月1日前撤消土耳其基地。”<sup>③</sup>

(3)从古巴导弹危机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出，“美国人正式承认苏联在摧毁性力量方面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sup>④</sup>通过古巴导弹危机，苏美双方都认识到，在核对抗中没有胜利者。在这种理念基础上，苏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如前所述，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动机，是企图以此形成苏美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双方政治上的平等和合作。虽然苏联最终从古巴撤出导弹，但却戏剧性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古巴导弹危机是苏美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手段进行的一次空前危险的对抗，冷战对峙被推到了核大战的边缘。核大战虽得到避免，但危机的巨大震动及其余波却相当深远。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这次危机都更尖锐、更清楚地暴露出核时代超级大国对抗中国有的风险和核讹诈政策的局限性。在60年代初期，尽管美国在核力量上处于优势，它所拥有的核武器储备能够多次摧毁苏联，但苏联的储备也能够摧毁美国，这就形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在核威力上的平等关系。因此，肯尼迪认为，“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sup>⑤</sup>“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爱他的邻国……只不过要让他们在相互宽容的情况下共同生存。”<sup>⑥</sup>基于此，当肯尼迪得到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报告时，没有立即下令对导弹基地进行空袭或者进攻古巴，而是力主采取“隔离”政策。事实上，在这一重大的封锁令下达之前，美国方面没有谁能说出：“倘若进行空袭或入侵，结果会是多么糟糕；双方的措施与反措施，行动与反行动，会怎样使得这个不幸的世界沦为可怕的绝境。”肯尼迪总统说：

“如果我们入侵古巴……我敢说，苏联人会采取行动。他们势必这样做，正像我们势必那样做一样。”<sup>⑦</sup>因此，他特别希望避免这样一类行动，即“由于‘安全’……或‘面子’上的原因非得对另一方的行动作出反应不可，而这反应倒过来又会……招致另一方来一个反反应，从而最终导致升级的武装冲突。”<sup>⑧</sup>

古巴导弹危机是东西方冷战的一个转折点。苏美真切地看到它们在某些方面，至少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有并行不悖或相互吻合的利益，并感到有必要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生命攸关的利益，于是苏美冷战中的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过去了。它们此后较为谨慎地避免直接对抗，特别是避免用核武器对抗，并谋求妥协和合作以维持核垄断，约束无核国家。事后，赫鲁晓夫强调在核时代必须显示“更加清醒的头脑”，加强国际关系中“理智的准则”，在重大问题上对美国妥协迁就，以实现苏美“和平合作”。美国对冷战政策也进行了某种反思和调整，开始承认苏联是一个平等的对手与伙伴。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发表演说，大谈在核时代如果爆发战争，苏美将成为首要目标而在24小时内被摧毁，美苏因而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纽带”；要求美国“重新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态度”。<sup>⑨</sup>此后，苏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既明争暗斗又避免危险的对抗，并进行一定的合作。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达成正是这种新特点的象征。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在国际上出现了这么一种见解：古巴导弹危机是以赫鲁晓夫作出重大让步而获得解决的，赫鲁晓夫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奉行了“投降主义”路线。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这一观点是必然的。那么，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及美国政府官员的看法就至关重要了。因此，我们通过论述和分析危机期间古美两国当事人的言行及危机之后他们的反思，就必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分析这场核对抗的结局。

①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第134~1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②③④ 同①，第640页，第669页和第686页

⑤⑥ [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第348页，第34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⑦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5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⑧ 莫顿·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第168~1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⑨ 《新华月报》1963年第7期第159~162页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是危机中的重要角色。当苏联准备在古巴部署导弹时,卡斯特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他认为,此举“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我们可能是和美帝国主义摊牌的第一个受害者”。<sup>⑩</sup>尽管他对此有所疑虑,但出于对抗美国的需要,他不仅同意而且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在危机发展到炽热化之时,卡斯特罗建议赫鲁晓夫“在与美国进行谈判时应以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威胁手段来击败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威胁”。<sup>⑪</sup>但令卡斯特罗意想不到的,苏联竟答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因此,卡斯特罗怒不可遏,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叛徒,认为苏联采取了退却、怯懦、投降的路线。<sup>⑫</sup>卡斯特罗对苏美背着古巴搞私下交易,全然不顾古巴主权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苏古关系并未因苏联撤走导弹而破裂,卡斯特罗在1964年春季对苏联进行的友好访问就是明证。

在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美国政府确定的目标是现实的,即迫使苏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而不是追求“彻底的胜利”。因此,当收听到苏联同意关于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广播信件后,肯尼迪不仅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家风度表示赞赏,而且还为美国政府官员“规定了一条大家都要遵守的方针,既不自夸,也不幸灾乐祸……也不自称取得了胜利”。<sup>⑬</sup>1982年9月27日,在古巴导弹危机20周

年的日子里,当年曾为肯尼迪决策班子的迪安·腊斯克等人联名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总结道:“我们将我们的要求局限于恢复原状,即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出核能力。这就既不要求‘完全的胜利’,又不要求‘无条件的投降’。”为达到此目的,美国政府作出了两个保证:第一,“我们公开地阐明,如果苏联撤出导弹,美国就不会入侵古巴”;第二,罗伯特·肯尼迪在总统的指示下私下向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保证,“一俟危机得以解决,美国将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sup>⑭</sup>应当说,腊斯克等人从危机时期的决策者和当事人这一特有的身份出发,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结局的总结是极具权威性的。

(责任编辑 蔡同昌)

<sup>⑩</sup> 朱明权:《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第254~2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sup>⑪</sup> 同<sup>⑩</sup>,第303页。

<sup>⑫</sup> 同<sup>⑪</sup>,第669页。

<sup>⑬</sup> 同<sup>⑫</sup>,第569页。

<sup>⑭</sup> 同<sup>⑩</sup>,第318~320页。

## 通 知

2002年度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年会将于8月在大连召开。会议主题:中国入世后的中拉关系

会议安排如下。第一天:当前拉美地区的热点问题,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与中拉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其前景;第二天: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亚洲和中国的挑战和机遇;第三天:当前拉美国际关系的特点,当前拉美政治形势及其特点。有意参加会议者请用电子邮件与学会秘书处联系。

E-Mail: wangsf@isc.cass.net.cn beijing6789@yahoo.com

地址:北京1104信箱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14009 传真:010-64014001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科研处

2002年4月2日